

ISSN 1997-3721

師大

台灣史

學報 No.

9

2016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
許雪姬

《師大台灣史學報》

第9期 頁53-98

2016年12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特約邀稿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 他們的時代

許雪姬*

摘要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三人，可以說活在同一個世代。而他們所面對的時代，自青壯年皇民化時期，之後日本敗戰投降、國民黨的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撤退來臺、白色恐怖／冷戰時期，乃至解嚴，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生前他們三個人互相認識，惺惺相惜，也都是文化人，但性格有別、結局各有不同。本文利用三人留下的主要史料，參以當代人的旁證，以皇民化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前後、白色恐怖這四個人生的階段來加以比較，以瞭解其共相與殊相。臺灣島在 1895、1945 年兩易其主，這三位臺灣菁英不能免於在中年改朝換代，各有因應方式，有的積極投入政界卻鳥盡弓藏，終究只是白忙一場；楊有機會進入公務系統，進行臺灣研究，卻因館撤而任臺大教職。呂赫若為推翻國民黨，加入共產黨，為了出版宣傳品，賣祖厝開印刷廠，直接投入反政府活動；卻因鍾浩東被捕，不得不進入武裝基地，從事危險的工作，終至意外喪生。1938 年吳新榮說陳逸松是正義的使徒、楊雲萍是熱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情的詩人，有異於吳新榮 1938 年的說法，筆者認為楊雲萍是良心的學者、呂赫若是正義的使徒，陳逸松呢？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

關鍵字：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皇民化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

一、前言

研究一個人已經有困難，何況是三個跨越兩個時代、又有留學經驗的越境者。之所以如此嘗試，是希望藉研究三人的生平去瞭解他們這個世代的人如何歷經時代的變遷，由其因應來認識人在時代下展現的普遍性、根源性及特殊性。如果以一個世代 30 年來計算，這三位皆出生於 1900 到 1920 年間，其中最年長和最年輕的只差 8 歲，是可以當同一個世代來討論。他們所經歷的時代到底為何？在進入主題之前，似應簡單做個交待。

1905 年日本帝國自從日俄戰爭取得勝利後一直到 1932 年九一八事變之間，期間雖受一次大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但可說是日本走向亞洲第一的時期。同時在俄國有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蘇聯共產黨、第三國際陸續成立（1919），影響所及，亞洲各國的共產黨也逐漸成立，首先中國共產黨於 1921 年成立、日本共產黨於 1922 年成立，¹ 在這樣的氛圍中，到東京去留學的學生，原本有的東京臺灣青年會，其會員不少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因而有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成立。² 1929 年四·一六事件，日本展開對日共的大檢舉，到 1930 年為止，共逮捕 1,500 人，在日本帝國外地的臺灣也受到影響，一向臺灣人反抗日本的民族主義右翼陣營外，左翼的農民組合成立於 1926 年，右翼的陣營也在 1927 年開始分裂，1928 年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同年在東京設置臺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與社會科學研究會有密切的聯繫；在島內，此後左傾的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都支持臺共，形成左翼勢力的結集。1931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開始逮捕臺共（包括臺灣人勞動互助社、赤色救援隊），隔年有 49 人被起訴，分別判處 2 至 15 年徒刑。³ 1914 年定讞，此後迄 1937 年不再見有總督府取締左翼的行動，可見左

¹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日本共產黨の七十年 黨史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94，2 刷），頁 52、57-58。

²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東京：綠蔭書房，1986，復刻版），頁 42-43。

³ 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民族運動史》（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1978），頁 75-146。

翼已在彈壓下無法活動，但左翼的思想仍生生不息。

戰後，左翼的報章雜誌續出，《政經報》、《臺灣評論》、《人民導報》、《自由報》乃至於《光明報》，面對行政長官公署的稅政，不斷報導、批判，原來右翼的人士也結集在《民報》，展開批判，和官方辦的《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南部版）大異其趣。何義麟認為戰後臺灣的媒體不僅具有民主批判的精神，「更進一步說，臺灣社會已經具有形成一個健全市民社會中所應有的公共領域。」⁴ 在此氛圍下，只要是文化人一定投身媒體，盡其社會責任。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而這之前發佈「戒嚴令」，頒佈「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從此進入白色恐怖時期。1987、1991、1992年解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法令、修改刑法100條後，臺灣終於走向民主化，2000年5月政黨輪替，而本文的這3位主角，一個在1951年於鹿窟山中過世，代表左翼武裝基地即將走入歷史；另兩位則有幸見到民進黨執政的2000年，各以95、94歲高齡別世。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的相關研究史料、研究成果不少。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楊雲萍的相關研究有林瑞明，〈楊雲萍的文學與歷史〉（2001）、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2002）、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2007）、洪淑苓，〈楊雲萍的民俗文化觀與民俗研究之特色〉（2009）、陳羿安，〈摸索「臺灣文化」的一個嘗試：楊雲萍的文學、民俗學與歷史學（1920-1970）〉（2013）；相關資料，以《楊雲萍全集》（2011），集其大成。⁵ 陳逸松相關資料，以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1994）、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2015）最重要，前者的資料性、可讀性極高。據《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所載，還有陳先生在北京的日記（1975年起共8年），「許多

⁴ 何義麟，〈《政經報》與《臺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臺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政經報》（臺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未著覆刻年），頁17。

⁵ 《楊雲萍全集》共8冊，文學之部（一）、（二）冊，由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歷史之部（一）至（四）冊、資料之部（一）、（二）冊，由許雪姬主編，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

珍貴的陳先生書信、手記、札記和文章。」⁶ 2011年底，陳逸松之女陳文惠，在《傳記文學》分4期發表〈陳逸松二三事〉，急於讓世人瞭解陳逸松由戰後到辭世這後半生的事。⁷ 2014年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指出戰後到二二八前後陳逸松的動向。⁸ 此外《臺灣新民報》中的專欄，《臺灣文學》中的小說、《政經報》中的社論，也都是重要的研究素材。往後如能出全集，相信會有更多人投入研究。呂赫若的小說在1936年即有人研究，迄1944年大約有8篇，1965年後（大約30年後）臺、日學者研究論文頗衆，對其小說風格、音樂活動、離奇的死亡，都有所關懷。⁹ 其中以同時代的作家葉石濤在1983年出版的《清秋—偽裝的皇民化謳歌》中指出呂赫若小說的特質，一針見血，最常被引用。¹⁰ 呂赫若用日文寫的小說，早在1936年就被譯成中文，¹¹ 而各書局也在1979年後出「臺灣文學全集」，有的針對戰前、有的注重戰後；有的是諸人合集、有的則是個人全集；第一次出現《呂赫若集》是由張恆豪主編，選擇9篇小說分別由譯者譯成中文，他說，這本小說集「皆為國內首度逐譯發表的中譯文，實可謂是當今研究呂赫若作品的最新資料、最有價值的小說結集。」¹² 由一個譯者將其小說全部譯完的，首推林至潔翻譯的《呂赫若小說全集》，林至潔稱呂赫若是「才華橫溢的作家，也是跨

⁶ 曾健民，〈序：打開新的歷史視野〉，《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臺北：聯合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10-11。

⁷ 陳文惠，〈陳逸松二三事（上）：一九四五—一九七二年之紀事〉，《傳記文學》99:5（2011年11月），頁4-21；〈陳逸松二三事（下）：一九七二至二〇〇〇年之紀事（一）〉，《傳記文學》99:6（2011年12月），頁93-104；〈陳逸松二三事（下）：一九七二至二〇〇〇年之紀事（二）〉，《傳記文學》100:1（2012年1月），頁80-90；〈陳逸松二三事（下）：一九七二至二〇〇〇年之紀事（三）〉，《傳記文學》100:2（2012年2月），頁120-134。

⁸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臺灣史研究》21:3（2014年9月），頁137-180。

⁹ 中島利郎等，〈呂赫若研究文獻目錄〉，《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 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東京：綠蔭書房，1999），頁417。

¹⁰ 葉石濤，〈清秋—偽裝的皇民化謳歌〉（臺北：前衛出版社，1983）。

¹¹ 呂赫若著、胡風譯，〈牛車〉，收入《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牛車〉一文，最先刊在《文學評論》2:2（1935年5月），頁107-136。

¹² 呂赫若著、張恆豪編，〈簡介〉，《呂赫若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越日帝和中國統臺兩個時代的臺灣第一才子。」¹³ 此後研究呂赫若、不懂日語者，得到一本較好的譯著。除了小說資料外，呂赫若 1942-1944 年的日記，以手稿本出版，另出版由鍾美芳譯的中譯本，¹⁴ 使其在皇民奉公會文化部的日常行事和當時所寫的小說互相對應，得以瞭解在非常時期的生活以及小說中的寓意。而其子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一文，也很值得參考。¹⁵

本文擬先談我何以挑選這三個人，並將這三人的生平分成幾個階段來檢視，一是二戰前，包括學、經歷以及皇民奉公會時期的動向；二是剛光復時到二二八事件；三是白恐期間；四是人生的選擇，最後在結論中討論三個人的特質以及他們如何面對時代和他們的人生。

二、為什麼選這三人

(一) 我和這三位前輩的奇緣

我挑選這三個人，箇中有其脈絡，留待下節討論。此處先談我對三人的了解。楊雲萍是我的業師，我聽過他三門課：「日人對於中國史學的研究」、「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南明史」，在完成博論時，他拿去看了一些時候，一字不改還給我，說可以考試了。後來博論《清代臺灣的綠營》出版時，他幫我寫了序，言簡意賅而寓意深遠。楊老師過世後，我幫他處理捐贈給臺大的書，並且在 2002 年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取得楊老師刻意保存 1941-1945 年間的信函，其中「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情報部」、「臺灣文學奉公會」、「日本文學

¹³ 林至潔，〈期待復活—再現呂赫若的文學生命〉，《呂赫若小說全集》(上)(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33。

¹⁴ 呂赫若著、鍾美芳譯，《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¹⁵ 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 457-494；也轉收錄於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下)(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06)，頁 696-729。本文中兩者皆用。

報國會」的相關函件、明信片，這些「皇民」的證據，在改朝換代時急需銷毀的文件，他卻整理好用細麻繩網綁，一直保存著，成為見證當時絕佳的史料，坊間所見不多。中研院臺史所為之數位化，並編輯《楊雲萍文書資料彙編目錄》（2008）。楊師母過世的那一年（2011），終於出版《楊雲萍全集》8冊，其中「文學之部」在師母安息主懷的前一天送到病床前，我終於達成任務。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出版後，我讀了好幾次，成為我進入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重要的入門書，當我看到該書描寫他看到楊老師：「看到一個身穿呆板的一中卡其制服和土氣鞋子的臺灣學生。」¹⁶ 回想起楊老師常告訴我，他和陳逸松是好朋友，陳常到楊家下圍棋，從此也對陳逸松感興趣。而我早在 1992 年將蔣渭川女婿高欽福提供李翼中寫的《帽簷述事》編入《二二八資料選輯（二）》時有一段，即政府之所以獲知戰前「臺灣獨立／自治事件」，「傳言陳逸松發此秘，陳為古屋〔貞雄〕至交，盡知其屈折。」¹⁷ 對李翼中的獨家報導深感困惑，對陳逸松的好奇更深。2011 年陳文惠女士將陳逸松接受林忠勝訪問時由其母自己錄的錄音帶帶來臺史所，希望我能整理，當時我即將卸任所長，而且還在主持一個有 13 位學者參加的大計劃，實無力及此，我想等退休後再做吧。後來陳女士與我聯絡數次，我皆告以此書高難度，我無法在短時間完成。這是後來由曾建民完成的原因。事實上，我在林忠勝要我幫忙寫《高玉樹回憶錄》的序時¹⁸ 曾問過他，戰後篇何時出？何以沒有觸及顏媿以及她的孩子們。他告訴我原因，但他也並未完全放棄整理，但隨著林忠勝過世，無法完成時，我在 2013 年 9 月擔任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時，有一名專任秘書，我請她逐片聽，已知每片的大概內容，但還是無力、沒時間完成。結果就被寫成因為「沒有經費」而沒有完成。¹⁹

¹⁶ 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 257。

¹⁷ 李翼中，〈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400。

¹⁸ 許雪姬，〈《高玉樹回憶錄》序〉，收於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國民黨治下的黨外市長：高玉樹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頁 vii-x。

¹⁹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 9。

開始注意呂赫若，全拜林至潔教授提點。也就是 1999 年我和林至潔教授都是「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1999-2014)的董事，她在我的慫恿下接受我的口述訪問，常常來中研院，她告訴我她在翻譯呂赫若的小說，引起我對呂赫若的興趣，2004 年《呂赫若日記》出版，而我在進行「楊雲萍全集」資料搜集時，也在該日記中找到有關楊雲萍的記載。林至潔為了呂赫若死於毒蛇咬，非政府「迫害」，無法獲得基金會補償，多次仗義直言而不果。我和呂赫若還有一個交集，乃是在其子呂芳雄與國家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的同意下，將《呂赫若日記》放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臺灣日記知識庫」中，方便讀者經由網路得以閱讀。

我和三人有如此珍緣、奇緣，造成了我非得寫這篇文章不可的原因之一。

(二) 這三個人彼此認識

楊雲萍在就讀臺北一中最後一年的 1926 年到日本旅行，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和才剛考上第六高等學校(岡山)的陳逸松見面。他們結緣於楊雲萍和江夢筆在 1925 年編的《人人》雜誌，楊在《臺灣民報》刊登廣告，聲稱這是第一本白話文文學雜誌，免費贈閱。陳因索閱而開始和楊通信。《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一書中提到兩人初見面的情況；而楊雲萍在 1954 年回憶他創刊《人人》前後的回顧時，就曾說，陳逸松在內的十多位²⁰ 曾對《人人》表示意見和援助，因而得以結交很多新朋友，陳逸松就是其中的一個，「當時他是日本岡山高等學校的學生，寫給我的信，是極其『纏綿』的。」²¹

至於陳逸松和呂赫若又如何認識？陳逸松在回憶錄上說他在 1942 年呂赫

²⁰ 《人人》第 2 期的〈編輯雜記〉中提到的人有「器人哥」(江夢筆)、飛熊、郭華州、□□、〔翁〕澤生、松谷、〔王〕詩琅、朝枝、自我、牧童、莫庵、啓文(黃瀛豹)、〔鄭〕作衡、〔江〕肖梅、鶴瘦、嶺秋、秋汀。除江夢筆不計外，共 16 人，但未見陳逸松之名、或筆名。見〈編輯雜記〉，《人人》第 2 號(1925.12)，收入《楊雲萍全集 1 文學之部(一)》，頁 39-40。

²¹ 楊雲萍，〈《人人》雜誌創刊前後〉，《楊雲萍全集 6 歷史之部(四)》，頁 13。

若回臺時，經由張文環的介紹而認識，他們初見面時應該在 5 月 11 日。²² 之後兩人交誼更密，陳的律師事務所和草山的白雲山莊，常見呂赫若和諸文人的影子。²³ 陳逸松特別於 10 月 14 日在其法律事務所的三樓為他舉辦茶會，請他演唱，介紹給文化界的朋友認識。²⁴ 呂赫若在他的日記有簡單的記載：

晚上：在陳逸松家開茶會，蔡女士和我獨唱。到會者陳炘、陳逢源、吳金鍊、王井泉、楊佐（三郎）夫婦、李超然夫婦、郭水潭、陳紹馨、張星建……相當盛大的聚會。十一點回去。²⁵

此後兩人交誼日密，他在日記上曾記一筆陳逸松對他文學的要求：「希望在文學上是更具民族愛的作品。」²⁶ 這可能是要求呂在陳逸松出資、張文環主編的《臺灣文學》上刊登的小說要有民族愛。按《臺灣文學》1941 年 5 月 27 日創刊，1943 年 12 月 25 日第 4 卷 1 號止，共 10 期。²⁷ 呂赫若短篇小說有 6 篇發表在《臺灣文學》上。陳逸松說呂：「對臺灣政治、文化的發展，懷抱著高度的熱情，我對他非常感心。……他在「臺灣文學」發表過……多篇作品，獲得很高的評價。」²⁸ 陳、呂兩人，不僅是《臺灣文學》的同人，也一起加入「厚生演劇研究會」，在戰前可以說是藝文界的同志。

在上述文化人聚集在王井泉、陳逸松家時，很少看到楊雲萍的影子。呂赫若和楊雲萍認識嗎？相信兩人早已互相知道，但真正的接觸，可看其 1943 年 1 月 10 日的日記，是如何形容他看到的楊雲萍：

他住在半山腰，口若懸河，滔滔不休。雖感佩其風流韻味與文學欲望，

22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 122，1942 年 5 月 11 日。

23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 163，1942 年 7 月 16 日；頁 188，1942 年 8 月 27 日。

24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274。

25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 217-218，1942 年 10 月 14 日。

26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 1943 年 5 月 24 日。

27 彭瑞金等合著，《臺灣文學史小事典》（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頁 144。

28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274。

終不過是一個老式學究而已。我無法同意他稍顯消極的文學觀。²⁹

這可能是呂赫若對楊雲萍的第一印象，往後也會去找楊雲萍聊天，某次和張冬芳去訪楊，楊臥病在床，「互相談論臺灣作家多搞陰謀活動。作家要以作品為第一、要寫出好作品。」³⁰ 有時和張文環去找楊雲萍「大談文學研究」。³¹ 1943年聖誕夜，呂和楊都到士林教會參加聖誕晚會。³² 由上可知呂和楊平時接觸少於呂之於陳，但在皇民奉公會時期，他們還有一些共同參與的活動，下節再敘。

（三）吳新榮眼中的陳、楊、呂

當時候另一個文人，1907年出生的吳新榮，他和陳早已認識，又經陳介紹，而認識了楊，故三人早在東京認識，吳又是作家，可以說是陳、楊的文學知友，每來臺北，定將2人當成必訪的對象，他1935年參觀始政四十週年臺灣紀念博覽會時，就去拜訪楊雲萍，然後和楊雲萍一起去造訪陳逸松。³³ 1938年陳逸松在《臺灣新民報》發表隨筆一篇〈學者、詩人、使徒〉，文中對知識人、感情人、行動人三種類型，做了很有趣的分析，³⁴ 吳新榮看完馬上將他的感想寫在明信片寄給他，指出臺灣過去雖有學者、詩人、使徒，但大都是些阿諛的學者、墮落的詩人、變態的使徒；而我們要的是有良心的學者、熱情的詩人、正義的使徒。他在日記中寫道：「想到陳逸松就會聯想到楊雲萍君和蘇子蘅君。事實上，陳逸松君是正義的使徒，楊雲萍君是熱情的詩人，而蘇子蘅

²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272，1943年1月10日。

³⁰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331-332，1943年4月24日。

³¹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368，1943年6月30日。

³² 《呂赫若日記》中譯本，頁215，1943年12月24日。

³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37）1（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頁156-157，1935年11月12日；《吳新榮日記全集》（1942）6，頁270，1942年5月16日。

³⁴ 陳逸松，〈學者、詩人、使徒〉，《臺灣新民報》，1938年，日期、版次不詳。轉引自《吳新榮日記全集》（1938）2，頁92-93，1938年7月15日。

君是良心的學者。」³⁵ 他對楊雲萍的詩有一定的評價，稱呼楊為「詩仙」，³⁶ 戰後楊雲萍誇吳新榮的詩稿〈颱風〉已達相當的水準，比王白淵之詩未有遜色，他認為楊雲萍「算是臺灣文化水準最高的權威者」，所以「受他的褒獎，也覺歡喜甚矣！」³⁷

略談了吳新榮對陳逸松、楊雲萍兩人的評價，他與呂赫若的關係如何？1936年6月1日，日記載著呂赫若的來信，稱呂「純然是一個激情的好男子」。³⁸ 呂也到佳里訪吳，吳因他是「同喜文藝愛好者」，因此招集在地文友一起座談。³⁹ 這時候正是呂赫若發表代表作〈牛車〉（1935年發表，翌年4月被收錄在《朝鮮臺灣短篇小說集—山靈》中），而呂在短短一、兩年間已有小說、隨筆發表，此時正在南投營盤公學校任教，⁴⁰ 是個新銳的作家。往後他和呂赫若都是《臺灣文學》的執筆者，他曾假設在《臺灣文學》秋季號，若刊登他的〈逝きし春の日記〉，則想要讓親朋好友以及文友來讀，呂赫若是其中之一。⁴¹ 他的〈亡妻記〉在《臺灣文學》刊登後，呂赫若予以讚揚，吳新榮雖覺於心有愧，「立即將它獻於雪芬靈前，祈求他的安息。」⁴² 不只是呂誇贊吳，吳也認為呂的小說「不管何時，其優美的運筆，令人佩服。」⁴³ 在1945年8月1日，日本即將投降前的半個月，呂赫若來拜訪吳新榮，告訴世界上各種新訊息。⁴⁴ 呂赫若

³⁵ 《吳新榮日記全集》（1938）2，頁272-273，1938年7月15日。

³⁶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3-1944）7，頁227，1943年11月12日。

³⁷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5-1947）8，頁317，1946年10月13日。

³⁸ 《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37）1，頁220，1936年6月1日。

³⁹ 《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37）1，頁239，1936年8月15日。

⁴⁰ 朱家慧等，〈呂赫若 著作年譜〉、黃英哲，〈呂赫若 略歷〉，《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文學 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頁399、408。

⁴¹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2）6，頁85，1942年5月16日。雖然呂赫若的名字前沒有○號，但有○的是指吳要「購送」的有40部，呂似非給不可者，我的看法是呂是一定會看得到。

⁴²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2）6，頁298，1942年7月11日。

⁴³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3-1944）7，頁370，1944年1月7日。

⁴⁴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5-1947）8，頁165，1945年8月1日。日記中說「在此大雨中，十多年未見面的臺北呂赫若君來訪。」事實上，他和呂在1943年11月13日，才一起參加過「臺灣文學決戰會議於臺北。」見《吳新榮日記全集》（1943）7，頁229，1943年11月13日。應該是指1936年之後呂再度到佳里拜訪吳，但這也不過前後10年。

可能也來訪問蘇新。他和呂赫若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臺北蘇新家，一起聽蘇新臧否當代人物。⁴⁵

不論由三個人留下的資料去證實這三個文化人在文學、民俗這一塊是有交集的；或由他們三人共同的朋友吳新榮的日記中也可得知一些互動的情形，因此將三個人合而視之，無任何疑慮。在未進入這三個人對時代肆應自主或不自主的人生選擇前，或許應當簡單介紹這三個人的生平。

三、楊、陳、呂三人小傳

雖然這三個文化人屬於同一世代，但呂赫若在世只有短短 38 年，他在臺灣文壇上、左翼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歷史上都有其地位。陳逸松是有俠氣、有政治雄心的律師，最後被迫前往中國，成為「進步人士」，評價人言言殊，享壽 94 歲。楊雲萍享年 95 歲，三人中年紀最大，活得最久，戰後的生涯平靜、富足，我常戲稱他為歷史界的「十全老人」。他們的一生簡介如下：

1、楊雲萍（1906-2000），原名友濂，後以字行。臺北士林人，幼從祖父學漢學，自稱「十三經可以倒背如流」。1914 年開始小學教育，1919 年八芝蘭公學校畢業，1921 年分別考取臺北醫學校和臺北州立第一中學，⁴⁶ 選擇後者進學，1926 年 3 月畢業。在學中發表第一篇隨筆〈一陳人之手記〉於《臺灣民報》，為了提倡白話文學，他與江夢筆（器人）於 1925 年 3 月合辦自稱為第一本臺灣白話文文學雜誌《人人》，12 月出版第 2 期而成絕響。第 2 期，他刊出舊詩〈吟草集〉，往後他解釋說，這表示他並不是不懂舊文學，而是舊文學已沒有存在的價值。連雅堂的舊文學也在其攻擊的範圍內，但連雅堂因看過楊的

⁴⁵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5-1947）8，頁 317，1946 年 10 月 13 日。

⁴⁶ 由於未滿 15 歲無法投考臺北醫學校，乃入八芝蘭公學校附設公立簡易農業學校就讀。

第一篇隨筆，因此認為懂得舊文學的楊才配攻擊舊文學。⁴⁷ 後人如何評價《人人》？同時代的葉石濤，承認此為「臺灣第一本白話文雜誌」；⁴⁸ 梁明雄則稱《人人》是在：「新舊文學論戰刺激後由臺灣人士創辦的第一本白話文純文藝雜誌。」⁴⁹ 1926年赴日本大學豫科就讀，1928年畢業，轉入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1931年畢業，1933年4月回臺。⁵⁰ 楊雲萍的白話文小說約有10篇，除了〈光臨〉、〈秋菊的一生〉外，皆輕薄短小，其中〈黃昏的蔗園〉和前述兩篇常為文學界介紹。此外還有舊體詩和隨筆，在日文詩方面，則由王仁德的清水書店於1943年11月為其出版《山河》一書。至於戰前的歷史著作第一篇是〈芝山巖考〉（1938年4月）。他的史著大半集中在考訂，評介前輩詩人及其作品，史料翻譯、解題、人物介紹、書評與文學民俗研究，而他之投身於臺灣研究，正如他在1939年於《臺灣日日新報》發表的〈臺大と臺灣の研究〉指出臺大非得設臺灣史講座、臺灣文學講座、廈門語講座不可，⁵¹ 同理，臺灣人也非研究自己的歷史、文學、語言不可，他自己正是實踐者。

戰後，他在《民報》寫數篇擲地有聲的時評、星期專論、社論，即〈紀念先烈〉、〈文獻的接收〉、〈奪還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等路」臺灣的文藝與學術〉、〈一個誤會〉，道盡一個知識份子對深化臺灣文化的期待，但經二個月的觀察，他失望了。⁵² 1946年是楊雲萍人生中關鍵的一年。他成為民報社編輯顧問兼論說委員、臺灣文化協進會的理事及編輯主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臺灣省編譯館編纂暨編審並兼臺灣研究組主任，⁵³ 以寫「社論」、編《臺

47 楊雲萍，〈《人人》雜誌創刊前後〉，《楊雲萍全集 6 歷史之部（四）》，頁 8-10。

48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頁 43。

49 梁明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154。

50 楊雲萍有〈東京別三弟〉一詩，表示「四月出帝城」，是在「文章無人買」、父親的資助只到3月，不得不回。見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 3（2006年3月），頁 123。

51 楊雲萍，〈臺大と臺灣の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15-17日，第3版、第3版、第6版。

52 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9（2007年6月），頁 16-17。

53 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 8 資料之部（二）》，頁 113-115。

灣文化》、推展臺灣研究；尤其是在臺灣省編譯館的任職，成為他進入臺大歷史系任教授的契機，也成為在臺灣開「臺灣史」課程的第一人，培育了往後致力研究臺灣史的人才。在臺灣史的研究上，他有著傳承來自吳德功、連雅堂等書寫、研究臺灣歷史的香火之使命。他的教學生涯前後 40 年（1947-1977 專任，1978-1986 兼任），2000 年過世。2011 年《楊雲萍全集 1-8 冊》出版。

2、陳逸松（1907-2000），筆名虞淵、疑雨山人，⁵⁴ 宜蘭羅東人。自中學即赴日就讀，分別畢業於日本岡山縣立第二中學、岡山第六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1931 年日本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及格。1933 年在臺北開律師事務所，甚至在廈門也開設出張所，此為他認識軍統局閩南站站長陳達元的契機。1935 年當選臺北市會議員，1941 年當選臺北辯護士會副會長。⁵⁵ 他不僅是律師，還經營事業，如在羅東開設蘭陽米穀株式會社、草山土地株式會社。⁵⁶ 1941 年因不滿當時文人發表的園地有限，而《文藝臺灣》⁵⁷ 是由日人西川滿出資、編輯、發刊的雜誌，「代表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對臺灣民眾的現實生活不關心」，遂出資創設《臺灣文學》，前後發行 11 期，由張文環主編，都屬於寫實主義的作品，「有時暴露了日人推動皇民化運動企圖剷除臺人民族意識過程中遭受的各種反抗和批判。」⁵⁸ 1943 年與林博秋、王井泉、呂赫若等，共組「厚生演劇研究社」。戰後被委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籌備處主任、臺北分團主任，與蘇新、顏永賢、陳逢源、陳炳等設立「政治經

⁵⁴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273。用此筆名發表過〈姊妹〉這篇小說於他出資的《臺灣文學》，第 2 號，頁 8-32。中島利郎在陳逸松傳中，直接說這是一篇失敗之作，評價不高。原文是「失敗作として酷評された」。中島利郎編著，《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頁 73-74。

⁵⁵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頁 255。

⁵⁶ 山川鄰，《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東京電報通信社，1941），頁 493。

⁵⁷ 1940 年 1 月創刊，1944 年 1 月 1 日停刊，共 38 期（7 卷 2 號）由台灣文藝家協會發行，編輯兼發行人西川滿。早期偏向浪漫、耽美的文學趣味，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乃調整方針，配合時局推出專輯，還有新詩、版畫，一些台灣作家如龍瑛宗、周金波的重要作品也刊登於此。《臺灣文學史小事典》，頁 141-142。

⁵⁸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61。

濟研究會」，探討戰後臺灣發生的各種問題，他不僅寫社論、開座談會也擔任編輯。⁵⁹ 1946年8月當選參政員，在戰後初期頗為活躍。二二八事件期間擔任處理委員，草擬三十二條要求，事件後被通緝，因林頂立、陳達元、陳儀的搭救，不但無事，1948年還得以擔任行憲後第一屆考試委員，1949年擔任中央銀行常務理事。⁶⁰ 1953年起經營厚生橡膠公司，1956年與張深切共組「藝林電影公司」，拍過「邱罔舍」等片，但以失敗收場。1964年參選省轄市民選第五屆臺北市長。他出來競選的原因是因中法建交，「國民政府遲早會走，萬一國民政府走了，臺北市政府所有的財產都會被帶走。」為了保住臺北市的財產才出來競選，⁶¹ 但未能當選。1970年前後正是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日中建交，美日建交指日可待之時，1970、1971年陸續發生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美國花旗銀行臺北分行爆炸案，據說都是日本臺獨聯盟策動的，而使用的炸藥則放在羊羹中，由於有日本人學生送羊羹給陳，陳逸松乃被送往保安處詢問，幸得家中羊羹未食用，且內未有炸藥，才得雪冤，但已被關三天四夜。⁶² 經此事件，已65歲的他決意出國，投奔中共。1972年經由中國華僑總會負責人林伯耀牽線，得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邀請乃於1972年前往，1974年「代表臺灣人民擔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⁶³ 1983年到1993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此時他離開北京轉東京到美國定居德州。1997年應林宗義之邀回臺參加林茂生百十歲週年紀念演講會，⁶⁴ 2000年在美國過世。妻顏媿，為顏雲年之妹，在兩本回憶錄中隻字未提。又娶林玲玉，長年跟隨。

3、呂赫若（1914-1951），本名呂石堆，臺中潭子人。1934年臺中師範學校演習科畢業，4月到新竹州竹東郡峨眉公學校擔任訓導，翌年轉職南投營盤

⁵⁹ 何義麟，〈《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政經報》，頁8-9。

⁶⁰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頁162-168。

⁶¹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159。

⁶²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181-182。

⁶³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215。

⁶⁴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373-374。

公學校，1938年回故鄉潭子公學校任教。1940年服務滿6年後，赴日學聲樂，入下八川圭祐音樂研究所，並一邊師事東京音樂學校教授長坂好子。⁶⁵ 8-12月在歐文社⁶⁶ 編集部任職。1941年1月入東京寶塚劇場演劇部，曾在歌謠 Show「歌ふ李香蘭」時以東寶聲樂隊一員演出。1942年5月因病回臺。在中山侑的介紹下於1943年1月就職於臺灣興行統制會社，4月和王井泉、陳逸松等人共組「厚生演劇研究會」，演出張文環小說改編的「闖鷄」。1944年8月在龍瑛宗推介下進入《臺灣新報》，在《旬刊臺新》編集部任職。戰後於9月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中央直屬臺灣區團臺中分團準備處股長，1946年1月入左翼的人民導報社擔任記者，6月因到高雄採訪簡吉及高雄發生的農民事件，而引起所謂「王添灯筆禍事件」，《人民導報》在政府的壓力下不得不改組編集部，遂離職。9月和蘇新等人在臺北創刊《自由報》（為週刊），以王添灯為社長。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據云《自由報》同人組織對策委員會，協助王添灯撰寫講稿、廣播稿及「三十二條處理大綱」，⁶⁷ 1948主編地下刊物《光明報》，此時也成為建國中學音樂老師，1949年擔任臺北一女中音樂老師，並與劉明合資設「大安印刷所」印製《光明報》。⁶⁸ 8月政府逮捕散發《光明報》的學生，是月底「基隆中學事件」發生，⁶⁹ 大安印刷所停業。接着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被破獲，蔡孝乾以下陸續被逮捕，乃不得不脫逃到鹿窟基地，1951年深夜在山中進行發送無線電報時被毒蛇咬死，⁷⁰ 得年38歲。妻林雪絨，兩人於1934年結婚，另有紅粉知己蘇玉蘭。⁷¹

⁶⁵ 長坂好子為呂之臺中師範學校恩師磯江清同屆。磯江清為宮崎縣人。不著編者，《臺中師範學校職員生徒名刺交換會》（臺中：該校，1929），頁2。

⁶⁶ 歐文社在1941年後改為旺文社，出版物之一為《螢雪》，做為考試指南。見陳姪溪，〈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19:1（2012年3月），頁117。

⁶⁷ 陳翠蓮在〈「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的頁151中，指出左翼人士強調32條是他們提出的，意在爭功。

⁶⁸ 黃英哲，〈呂赫若 略歷〉，頁409-411。

⁶⁹ 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臺北：該局，1961），頁1-9。

⁷⁰ 薛宗明，〈哭泣的鹿窟：台灣第一位男高音—殉道者呂赫若素描〉（上）（下），《樂覽》，8、9期（2000年2月、3月），頁8-18，頁12-20。

⁷¹ 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頁478。

至於其膾炙人口的小說，有 1935 年 1 月 1 日刊登在《文學評論》的〈牛車〉以及一連串在《臺灣文學》刊出的小說，其中〈財子壽〉（2 卷 3 號）得到第一回「臺灣文學賞」，〈風水〉（2 卷 4 號）、〈月夜〉（3 卷 1 號）、〈合家平安〉（3 卷 2 號）、〈柘榴〉（3 卷 3 號）、〈玉蘭花〉（4 卷 1 號），1944 年由清水書店出版《清秋》小說集。戰後用中文寫了〈戰爭的故事（一）、（二）—改姓名〉、〈月光光—光復以前〉、〈冬夜〉三篇小說，分別發表在《政經報》、《新新》、《臺灣文化》。他的小說評價甚高，葉石濤說他在「日據時代作家中是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⁷² 也有說他和龍瑛宗、張文環是戰爭中最活躍的作家之一。⁷³ 陳芳明則說呂赫若的小說「不但營造了戰爭年代的臺灣之美，也鍛鑄了動盪時代的歷史記憶。」⁷⁴ 呂赫若是個男高音，戰後被臺灣文化協進會聘為音樂演奏會的籌備委員、聲樂專門審查委員，也開過第一次籌備會，但因二二八事件發生而告無疾而終。1949 年曾在中山堂開過獨唱會。他兒子呂芳雄說他父親在世時「風度翩翩，英俊瀟灑，集作家、聲樂家於一身，多才多藝，是一些女性崇拜的偶像，在當時的文藝界，被戲稱為『文化界的風流人物』。」⁷⁵

呂赫若是目前為止被研究最多的小說家，他的僅存日記由國家台灣文學館在 2004 年底出版，既中譯又解讀，相信此日記的出版對呂赫若的研究提供最珍貴的一手史料。

簡單描述我所瞭解的這三個人，接下來要分別探討在皇民奉公會時期、二二八前後、1949 年後這個時期三人所參與的活動，看是否能看到文化人因應時代變遷中的共相和殊相。

⁷²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 64。

⁷³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小事典》，頁 118。

⁷⁴ 陳芳明，〈廢墟之花—呂赫若小說的藝術光澤〉，收入《呂赫若小說集（上）》，頁 31。

⁷⁵ 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 715。

四、在最黑暗的戰爭時期下的因應

要談到戰爭時期下三人各自的因應，有必要先了解他們之前的左翼思想和行動，其次是他們在皇民奉公會成立後無可避免的加入團體和「皇民文學」創作，再者，在戰爭中這三人有那些交集。

(一) 求學時期加入的左翼團體

1921年東京臺灣留學生將在1915年成立的「高砂青年會」，改組為東京臺灣青年會。該會一向支持由林獻堂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盡全力支援來京請願代表。但不久臺灣青年會就出現部分青年與此不同調，認為要增進「本島人」之福利，應服從支持臺灣總督府的施政，以謀求祖國的同化，故在1923年組織「臺灣同仁會」，⁷⁶ 但這百餘名的留學生對臺灣青年會的影響不大。影響內部結構的反而是受當代思潮影響的學生，其反日不再只是民族自決主義的思想，漸受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研讀馬克斯主義，這一批對社會科學研究有興趣者，漸漸和幹部派有了衝突。這批人中以日大的許乃昌、⁷⁷ 楊貴（達）、楊雲萍，帝大生商滿生、高天成（後成為林獻堂的女婿），中大生黃宗堯，專修生林朝宗，印刷工林聰為主，在帝大新人會⁷⁸ 的指導下，決定在青年會內提案設立「社會科學研究部」，並將加強和臺灣島內、日本國內的左翼團體和中國人和朝鮮人團體互相聯繫，1927年4月乃告成立。此時原青年會幹

⁷⁶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35-37。

⁷⁷ 許乃昌（1907-1975），是臺灣最早的共產主義者之一，彰化人，192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又加入中國國民黨。9月經中共和第三國際指派去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讀書，取得 Ionov（約諾夫）的假名。1925年8月前往東京。見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54。因有蘇聯經驗，乃成為此一團體的思想重鎮。

⁷⁸ 所謂帝大新人會是東京帝大日本學生的組織，由極左的馬克斯、無政府主義，到極右的國家主義者都有。此會從事專題研究再集會討論，專題範圍很廣，對會員的影響很大，1918年成立，前後有會員300多人，台灣學生只有陳逸松一人入會，經1928年的三、一五大檢舉，而在1932年解散。《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101-104。

部決議要將這些左傾者驅逐出會，但未能成功。⁷⁹ 這時舊幹部聲明總辭，而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會員乃得以控制青年會，並召開青年會幹部臨時總會，黃宗壘、楊雲萍等人當選為幹部。舊幹部賴遠輝等乃籌劃奪回，並去信臺灣，要向來捐助青年會的林熊徵、辜顯榮、林獻堂等人停止捐款。⁸⁰

正當社會科學研究部成員逐漸控制青年會，且不再滿足於僅於「研究」，而走入實踐的方向時，不料 1928 年 3 月以後日本共產黨被檢舉，相關左翼團體被下令解散，該部也受到嚴重的取締。原來聲明總辭的幹部，也想趁機奪回青年會的主控權。面對此嚴酷的局面，該部乃正式自青年會獨立出來，改成社會科學研究會，5 月被禁止後乃改名「臺灣學術研究會」。雖然該會活動愈來愈尖銳化，但因日本左翼組織不斷被取締，使該會行動受到了掣肘。⁸¹

1928 年臺灣共產黨成立於上海，旋在東京設立特別支部，擴大共產黨在臺灣青年會和臺灣學術研究會的影響力，10 月 5 日以陳來旺為首的臺共特別支部成員，召開學術研究會委員會，商討有關研究會的各項事宜。經 3 次會議，年底終於決定組織方針等，原則上各校分開組織，若有特殊情形時，才採取區域別的組織。在學校班中帝大班以陳逸松為首、東醫（東京醫專）班以吳新榮為首，吳新榮又同時是地域班戶塚町班的負責人；至於學校班的委員長則是蘇新。⁸² 往後陳逸松、蘇新、吳新榮間的關聯，由此時已肇其端緒。1929 年臺灣學術研究會成功地將青年會完全置於其領導之下，決定發行《會訊》，連合各大學學生成立學生團體，設置中央幹部，此時吳新榮在會計部，而蘇新在書記部，⁸³ 楊雲萍已不再在名單內。1930 年臺共東京特別支部被檢舉後，有 43 個學術研究會會員被捕，除 3 人（陳來旺、林兌、林添進）外都被釋放，

79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 40。

80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 40-41。

81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 42。

82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 45。

83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 46。陳逸松在 1929 年初因原教育部長張聘三回臺，而接任教育部長。《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112。

但因有人回臺參加島內戰線，因此缺少領導人而活動逐漸停頓。而後在主要會員獲釋後，仍不願放棄既定方針，準備伺機而動。但因情勢，仍暫緩行動，9月再組讀書會，在輪流舉行數次後已變得徒具虛名，遂走入歷史。⁸⁴

在1930年臺共被檢舉過後，學術研究會逐漸停頓時，林寶煙（曾當過上述研究會地域班目黑班的負責人）⁸⁵ 卻主張復興研究會要打好基礎，再以地下運動方式進行再組織，也參加讀書會，並成為負責人，應是重要的左翼青年。⁸⁶ 他正是未來呂赫若的妻舅。1933年呂赫若在臺中師範五年級的第三學期（最後一學期），因有友人購讀左翼雜誌，也被牽連在內，受到調查；再加上準備寫勞資問題的小說，因而被停學12天。⁸⁷ 而本年夏天他和林寶煙的妹妹林雪絨締親，在此前後常前往拜訪林寶煙以取得左翼有關知識。⁸⁸

這三位受過左翼思潮洗禮的年輕人，楊雲萍在研究思想時曾投入，當要化成實踐，並成為小組時，再經1928年的大檢舉後，以他不喜歡政治活動的性格，他不可能繼續參加。陳逸松則喜歡站在思想的前端，是基於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理想追求社會的均富與繁榮，積極參與，在留學時期的表現已經決定往後兩人不同的人生。呂赫若則經由林寶煙接觸左翼思想，而他在〈牛車〉中，也道盡現代化文明進步下趕不上時代的牛車夫一家的慘狀，以及警察的取締，使貧苦的牛車夫鋌而走險，終至被捕。小說中的反資本主義、壓迫者的心情躍然紙上，由此亦可窺知其未來加入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之組織及其原因。總之，這三位或多或少都受到大正末到昭和時期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運動之影響，但可看出他們也承繼了自明治末到大正時期的教養主義。

⁸⁴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52。

⁸⁵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45。

⁸⁶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50。

⁸⁷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52。

⁸⁸ 黃英哲編，〈呂赫若 著作年譜〉，《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頁407-408。

(二) 皇民奉公會下的文化活動—苦悶的日子

在戰爭下，有關皇民化運動、皇民奉公會下的臺灣人是否成為被「奴化」的「皇民」，此一問題牽涉複雜的面相。戰後來臺接收的中國官員認為臺灣人都被「奴化」，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迄今仍用「皇民」兩個字來指稱被日本統治過的臺灣人。做為文化人的這三個人，如何渡過這個時期？陳逸松在他的回憶錄中稱戰爭期間是苦悶的日子，充分顯露出必須陽奉陰違、口是心非地渡過1937年以後到終戰，特別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楊雲萍和陳逸松與呂赫若，有職業上的不同，楊是「自由作家」，他必須多多寫稿，以配合不同雜誌的需要，除了小說，大半言簡意賅。自他由日本回臺期間（1934-1945），他投稿的報章雜誌有《先發部隊》、《臺灣新民報》、《臺灣新文學》、《愛書》、《臺灣日日新報》、《臺灣風土》、《華麗島》、《文藝臺灣》、《臺灣藝術》、《臺灣時報》、《民俗臺灣》、《臺灣地方行政》、⁸⁹《臺灣文學》、《文學報國》、《臺灣公論》、《新建設》、《旬刊臺新》，這些報章雜誌大半是由日本人主編。所以他和日本文化人有一定的交往，如西川滿、金關丈夫。1941年《民俗臺灣》創刊，金關寫的「趣意書」肯定日人的皇民化政策，再說明有可能在運動過程中破壞原無弊害的舊慣，因此文明國民有加以記錄的必要。楊雲萍對此言論有所疑慮，乃為文要金關澄清，他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理由外，還包括一向研究臺灣民俗的他竟非發起人，⁹⁰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是為打開投稿《民俗臺灣》的徑路。

在1941-1945年臺灣文學統制的團體有皇民奉公會文化部（1943年4月改為臺灣文學奉公會）、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而這兩個團體可稱為一個班子兩塊招牌，至於臺灣總督府則設置情報課來介入。在這戰爭苦悶的日子

⁸⁹ 《臺灣地方行政》（1935-1943）為臺灣地方自治協會所發行的雜誌。楊在1941年發表在7卷7期的文章為〈「大嵯岨撫墾署報告」に就いて〉。1943年時該誌也向楊徵求隨筆與詩稿。許雪姬主編，《楊雲萍文書資料彙編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164。

⁹⁰ 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頁11-12。

裡，楊參加了那些文學活動又擔任那些職位？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文化部時他並未成為部員，1943年4月改為臺灣文學奉公會後，才被聘為詩部會員，繼被聘為評論隨筆部委員，⁹¹ 當時他已是詩部會員，是否適合再當評論隨筆部委員，猶豫不決，問之於矢野蜂人，矢野也認為不恰當，因此他選擇了後者，以後他才知道日本文人更多的是擔任兩種職位者，因而撰文表示，當了委員不是因為「作家」的身份受到評價，而是「因為事務上的需要受到發配。」⁹² 同年4月他被日本文學報國會推薦為參加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四名代表之一，這次會議的主題是「發揚決戰精神，擊滅英美文化與確立共榮圈文化之方法」，會中各地區代表來自日本、中國（汪政權）、滿洲、朝鮮、蒙古、臺灣，各自踴躍發言，臺灣人代表周金波發表「皇民文學的樹立」，⁹³ 楊雲萍在會議中的發言有兩點，一是編纂大東亞各國各地域的文學史或其概要之類的書；二是關於中國書籍騰貴的對策。⁹⁴ 看似不著邊際的打高空，卻是高明的應對辦法，比起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的張文環「感謝從軍作家」、龍瑛宗「感謝皇軍」的發言內容，不可以道理計。⁹⁵ 10月受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之邀，翻譯庄司總一的大作《陳夫人》第一部與第二部，此小說曾得第一屆大東亞文學獎次獎（首獎從缺），但並未譯出。此譯文原本要在《華文每日》刊登，每日1,000字，但未見刊登，只留下最早的部份譯稿。⁹⁶ 1944年擔任戰時思想文化委員會文學關係委員會四名臺灣人作家之一，又加入為日本文學報國會詩部會的會員。再受皇民奉公會委任為戰時思想文化委員會大東亞理念與興亞思想小

⁹¹ 許雪姬編，〈33. 台灣文學奉公會〉，《楊雲萍文書資料彙編目錄》，頁162。

⁹² 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文學奉公會其他〉，《楊雲萍全集2 文學之部（二）》，頁203。

⁹³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臺灣文學史小事典》，頁149-150。

⁹⁴ 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2 文學之部（二）》，頁208-209。在〈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感言〉，也沒有配合當局的言論出現。見同書，頁344-346。即使在臺灣決戰文學會議上的發言，也再度強調台灣文學史的編纂，立場始終沒有改變。〈台灣決戰文學會議發言〉，同前書，頁364。

⁹⁵ 轉引自《臺灣文學史小事典》，頁149-150。

⁹⁶ 楊雲萍，〈陳夫人〉，《楊雲萍全集7 資料之部（一）》，頁11-29。

委員會會員。⁹⁷ 1944年奉臺灣文學奉公會（實為臺灣總督府情報課主導）之命，到纖維工場、金瓜石銅山、謝慶農場、鐵路等地參觀，⁹⁸ 他和呂赫若是13個作家中的2個，呂赫若有〈風頭水尾〉的發表，楊雲萍則發表〈鐵道詩鈔〉，都收入《決戰小說集》。

如果分析1941年到1945年楊雲萍的作品，以臺灣研究的作品為多，唯一有點「皇民文學」嫌疑的，是自1944年1月起連載在《新建設》迄1945年2月止前後8次的〈部落日記〉⁹⁹ 以及前述的〈鐵道詩鈔〉，但這些作品不受文壇重視，也沒有當代或後代的人將之放入皇民文學中。楊在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性，毋寧是他的詩，他在1943年出版《山河》，其中有一首〈猩猩—動物園詩抄のうち—〉，林瑞明給予高度的評析，認為該詩顯示詩人回應時代的抗議精神，象徵性的表現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可以歷久而彌新。¹⁰⁰

呂赫若1939年因病回臺後，到1942年才成為《臺灣文學》的同仁，並進入《興南新聞》當記者，1943年經文友中山侑介紹，進入興行統制會社，¹⁰¹ 1943年4月與陳逸松等人成立厚生演劇研究會，同時也參加臺灣文學奉公會的成立大會，年底小說〈財子壽〉得到啓文社的第二回「臺灣人文學賞」，1944年3月由清水書店出版《清秋》小說集，6月和楊雲萍一樣當派遣作家，發表戰地報導文學〈風頭水尾〉，並收入《決戰小說集》。8月臺灣文學奉公會為強化組成員，增加5名常務理事，呂為其中之一，且是唯一的臺灣人。如果以發

⁹⁷ 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 8 資料之部（二）》，頁11-12。

⁹⁸ 地點有金瓜石銅山、謝慶農場、纖維工場。許雪姬主編，《楊雲萍文書資料彙編目錄》，頁170，「台灣總督府情報課」；〈派遣作家的感想〉，《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頁395-396。

⁹⁹ 他在企劃〈部落日記〉一書時，說明其目的「在於要表現並創作出在戰爭時局下的臺灣農村真實的面貌及應有之道。……讓彼等臺灣新百姓的道路及皇民化的道路能得到指示，……。」楊雲萍，〈出版企劃書之記載〉，《楊雲萍全集 7 資料之部（一）》，頁3。

¹⁰⁰ 林瑞明，〈楊雲萍的文學與歷史〉，《楊雲萍全集 1 文學之部（一）》，頁25。動物園詩抄中還有〈虎〉。

¹⁰¹ 臺灣總督府情報部在1943年3月所成立，旨在統制電影的發行與其他所有表演活動的演出，特別是管制台灣人最喜歡的戲劇活動。李道明，〈驀然回首—臺灣電影一百年〉，《歷史月刊》，158（2001年3月），頁43。

表雜誌來決定其內容是否為皇民文學，雖不盡客觀，但卻可能會被首先檢視，如他小說〈山川草木〉、〈一協和音にでも〉、〈百姓〉都發表在臺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刊物《臺灣文藝》上，¹⁰² 以皇民奉公會本部派遣的名義，在《新建設》上發表〈妻ありて兵強し 新しき誇り〉一文，¹⁰³ 以及編寫配合戰爭節奏的劇本、廣播劇，¹⁰⁴ 七〇年代臺灣文學漸被研究以後，少數研究者一定會將每一篇在 1941-1945 年發表的文章放大檢視。幸而反國民黨的他在 1951 年離奇死亡，再者葉石濤在 1983 年為其辯誣，「臺灣第一才子」的形象逐漸固定，不會去談他所創作的是皇民文學。雖然楊雲萍認為彼時臺灣文藝界，水平最高的還是詩，但仍對呂的小說有所期待，¹⁰⁵ 可見呂的文學成就，並非浪得虛名。

楊、呂這兩個同時代的文學家一長於詩、一長於小說，在戰時殖民惡劣、苦悶的環境下，為達成藝術的夢想，仍然堅守文學之道，而又能不被當局取締，顯見有高超的文學手法才能避過。誠如翻譯呂赫若小說的林至潔，說呂赫若既要應付當局要求寫奉公文學，又要不違背民族良知很難，¹⁰⁶ 這話同樣可以用在楊雲萍身上。

相較於楊、呂兩人，陳逸松的主業是律師，但愛好文藝，又有一批文友，以王井泉的山水亭，他在草山的白雲山莊、大稻埕的律師事務所，為文人集結之處，呂赫若是成員之一，楊雲萍則較少出席。在 1937 到 1945 期間，這批文友不滿《文藝臺灣》的耽美、偏新詩，又配合時局編專輯，在陳逸松的支助下出而創立《臺灣文學》，又因對 1943 年臺灣演劇協會與興南新聞所籌組的「藝能文化研究會」所做的 4 次公演，盡演皇民劇以達成其「大東亞演劇」的構想不滿，使部分《臺灣文學》的成員再出而組成「厚生演劇研究會」，9 月演出

¹⁰² 〈呂赫若 著作年譜〉，《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 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頁 400-403。

¹⁰³ 陳逸松，〈妻ありて兵強し 新しき誇り〉，《新建設》4（1944 年 4 月），頁 20-22。

¹⁰⁴ 陳芳明，〈廢墟之花—呂赫若小說的藝術光澤〉，《呂赫若小說全集（上）》，頁 24。其劇如「結婚圖」、「林投姊」、「演奏會」、「日本の子」、「源義經」、「麒麟兒」。

¹⁰⁵ 〈台灣文藝界這一年〉，《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頁 174。

¹⁰⁶ 林至潔，〈期待復活—再現呂赫若的文學生命〉，《呂赫若小說全集（上）》，頁 44。

張文環的作品「閩雞」，這代表臺灣藝文界對皇民化戲劇政策的一股反抗力量，也可視為日治末期民間向官方的一次挑戰。¹⁰⁷ 這兩件事陳逸松、呂赫若是其中的要角。

除了上述的活動外，以當時陳逸松的知名度，是不可能讓他在 1941 年 4 月成立的皇民奉公會中脫身。此會在中央設總裁，由長谷川清總督擔任，再設「參與」、「顧問」，為會的最上層，之下設中央本部，由總務長官齋藤樹統籌以下的奉公委員會與事務機關，之下設州廳支部，郡市支會，街庄分會、區會，一直到奉公班，地方上的知名之士莫不羅致其中。¹⁰⁸ 陳逸松本被臺北州的支部長任命為「參與」，但因軍部認為陳逸松為「非國民」前往臺北州抗議，陳逸松因而免入戰後國府清算皇民奉公會會員的名單中；¹⁰⁹ 雖然免當臺北州的參與，但他並非能躲過為「聖戰」服務的「光榮」使命。先是在珍珠港事變後，日方要動用地方知名之士到各地去替日本人說話，臺北州就選上陳逢源、陳金萬、陳逸松三人，三陳奉命從臺北一路南下到高雄演講，為了不違背良心，演講只好兜圈子。1941 東港事件爆發時，因與歐清石是老朋友，險被羅織入獄。也不能不發表〈事變處理と本島人の使命〉，鼓吹臺灣青年的使命是成為大和、漢民族結合之楔，成為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礎石。¹¹⁰ 隨著戰爭愈來愈激烈，1944 年起，美國空軍已在臺灣進行猛烈的轟炸，為了加強各地的防禦工事，乃在 5 月於臺北州成立「勞動奉公隊」，派在坪頂（林口）工作，陳所屬的第一隊有 5,000 人，任務是修飛機場，以林熊祥為隊長，陳逸松為總務部長。此一工作每天進行 11 至 12 小時，¹¹¹ 他還得參加座談會，談〈思想對策と方向：

¹⁰⁷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1991，再版），頁 329-330。

¹⁰⁸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該府，1945），頁 79-80；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 年 6 月），頁 200-204。

¹⁰⁹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231-232。

¹¹⁰ 陳逸松，〈事變處理と本島人の使命〉，《臺灣地方行政》，7:9（1941 年 9 月），頁 101-103。

¹¹¹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241。

戰場臺灣の基盤〉。¹¹² 陳逸松認為是在戰爭中最艱苦的黑暗時期，敢於反抗日本當局的南部是楊金虎、北部就是他，所以日本人必欲除他而後快，所以軍部曾計劃要在美軍登陸臺灣時，把反抗日本的知識份子「非國民」盡皆殺害，幸虧美軍未登陸臺灣，才得保全性命於亂世。¹¹³

五、二二八前後 (1945.8-1951)

(一) 戰後初期的情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臺灣人的感受各有不同，陳逸松在當天打開收音機，聽不清楚「玉音放送」的內容，以為又是鼓吹聖戰的野狐禪，乃到知友王井泉開設的山水亭，經過臺北州特高課警部補佐佐木告知，才知道日本已經投降。他描述當時臺灣人的心情：「這種喜悅最初只敢埋在心底，漸漸喜上眉梢，最後才沸騰奔放開來。」¹¹⁴ 於是大肆慶祝。他的朋友吳新榮則痛快地與朋友跳入河中，¹¹⁵ 似乎要洗淨日本統治時蒙上的塵埃。但欣喜中仍有不安，日軍武力尚在臺，中國軍隊一時不會來，這段空窗期要如何度過，臺灣人一無所知，一如她在 50 年前被割讓給日本一般。為此，有人試探獨立的可能性，但在安藤利吉總督反對下，無疾而終。原本這只是關心臺灣人未來的選項之一，沒料到竟成為史上所稱的「八·一五臺灣獨立事件」。¹¹⁶ 8月下旬所有警

¹¹² 陳逸松、林宗賢、栗原廣美、古屋貞雄，〈思想對策と方向：戰場臺灣の基盤〉，《臺灣公論》，1944年10月號（1944.10），頁38-51。

¹¹³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289。

¹¹⁴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294。

¹¹⁵ 《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頁174，1945年8月16日。

¹¹⁶ 當時面對臺灣的未來，似乎有4種選項，一是獨立，二是高度自治，三是歡迎國民黨政府，四是投向中共；然而中國和列強的條約上規範，臺灣只能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許雪姬，〈戰後初期臺灣人對未來前途的看法與其具體行動〉，收於謝政諭等編，《何謂戰後：亞洲的1945年及其之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37-62。

報、電燈管制取消，米也恢復配給，民間生活漸漸恢復常態。農曆 7 月 7 日、7 月 15 日恢復祭神。由於確認中國政府不久將來接收，因此臺人紛紛打聽彼岸的消息，能官話（即北京話、國語）的開始復習，甚至開始當起官話老師。原臺共分子、左翼人士也積極聯繫，重新集結，10 月 5 日即有臺灣人民協會成立，所選舉的中央委員為原臺共謝雪紅等人，20 日成立「臺灣農民協會」。¹¹⁷ 左翼人士對奉行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已做好對抗的準備。中共對在臺灣黨務的推動也相當積極，1945 年 8 月派蔡孝乾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翌年 2 月率張志忠等幹部分批抵達上海，4 月張志忠回臺，6 月舊臺共併入中共系統，¹¹⁸ 7 月蔡孝乾回臺，一直到他在 1950 年 2 月被捕為止，¹¹⁹ 都是中共在臺最高負責人。

國民政府在 8 月 24 日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而在中國政府、軍隊未來臺前，美國戰略情報處（簡稱 OSS）與中國軍統局的人員已先抵臺。軍統局人員有三名，分別是張士德、黃昭明、黃澄淵。¹²⁰ 10 月 5 日「臺灣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一行抵臺。國府軍隊與接收官員大致在 10 月 25 日前後抵達，25 日舉行受降典禮，國府開始統治臺灣。之後統治的失敗、人民的困苦，對臺人的差別待遇，聲稱臺灣人被奴化，清算「漢奸、戰犯」不一而足。這些都形成二二八事件的遠因，學界早已有諸多研究可供參考。

（二）陳逸松在戰後、二二八事件中表現積極

陳逸松是律師，日治時期累積了相當的聲望，當過臺北市會議員，更因從事社會運動、資助文化活動頗有令譽，在皇民化時期並沒有媚日的舉動，再加上有漢文底子兼有中國經驗，因此成為黨團延攬的對象。有關陳逸松戰後的行

¹¹⁷ 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我的回憶》（臺北：楊翠華自刊本，2005），頁 219；莊嘉農（蘇新），《憤怒的臺灣》（香港：智源書局，1949），頁 95。

¹¹⁸ 楊克煌遺稿，《我的回憶》，頁 249。

¹¹⁹ 國家安全局，〈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 11-19。

¹²⁰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頁 141。

動與軍統的關係，陳翠蓮於 2014 年 9 月發表論文，引據相關檔案，指出二二八前後陳逸松的角色，但陳逸松戰後的回憶錄中，完全撇清他和軍統間的關係。他說與 OSS 一起來臺的軍統人員，以臺灣義勇隊副隊長名義回臺的張士德，在 8 月 31 日傍晚找他到張所居住的梅屋敷見面，要他組織青年人，維持國軍未來前的治安，監視日本人的行動並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因用紅紙寫了一道「日日命令」，任命陳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主任」，於是團部下的分團在各地成立，由各地自行運作，有事再找陳商議。就這樣，他帶領的三青團部維持了日本投降後 70 天「真空狀態」的治安。¹²¹ 他這個主任，既是行政官也是裁判官，還到各處去演講，「事實上等於是一個地方政府」，還有人傳說他要當臺北州知事。¹²² 隨著政府順利接收而鳥盡弓藏。李友邦在 12 月 8 日回到臺灣，1946 年 2 月由李友邦擔任改組後的臺灣支團部的團長，陳退而當臺北分團團長，再經兩個月由洪石柱接任，¹²³ 此後乃致力於《政經報》的經營。

先是 1945 年 9 月陳邀舊同志蘇新到臺北，並和友人商量後決定組「臺灣政治經濟研究會」發行《政經報》為喉舌，經費由陳出，蘇因有編左翼報紙《臺灣大眾時報》的經驗，因此當主編。由於雜誌的言論有「攻擊物價問題，主張不得歧視臺灣人，強調實施市長民選，實行地方自治」¹²⁴ 等不合政府脾味的言論，再加上刊物已成為「政論性刊物」，因此到 1946 年 7 月 25 日，共發行 11 期就停刊了，這是談論戰後本土左翼人士的言論活動，所不可忽視的雜誌。¹²⁵ 8 月陳逸松當選參政員，也參加了月底的「臺灣光復致敬團」，上述作為皆顯示陳對政治的參與既積極又有雄心。

¹²¹ 有別於陳逸松的說法，蘇瑤崇的研究則指出，總督府一直有效統治臺灣，直到被接收為止，並無所謂「政治真空期」；而青年團所扮演的角色，則是煽動臺灣民眾仇日，而使日人成為百姓報復洩恨的對象。在日人的資料中，三青團是不被國府承認的地下組織，是企圖製造混亂的幫兇。見蘇瑤崇，〈臺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與所反映的戰後問題〉，《臺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頁 27-28。

¹²²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頁 303-304。

¹²³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 69-70。

¹²⁴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 74-75。

¹²⁵ 何義麟，〈《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頁 10。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逸松以參政員的身分角色吃重，先是召集臺灣各級民意代表，和民眾代表在3月1日開會成立「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又起草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章程」、「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案」，在3月5日通過。3月6日當選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而「二二八事件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則是由蘇新、蕭來福、潘欽信、林良材、蔡慶榮幫王添灯所擬。當3月7日這天在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外加十條要求送給陳儀後，陳儀斷然拒絕，而他也被通緝。陳知大事不妙，在劉明帶領下躲到陳達元家。3月14、15日時由陳達元陪同去見陳儀，經一番折衝，陳儀才下條子（紅框便箋）解除其通緝令。到5月，尚未離職的工礦處處長包可永請劉明當工礦公司董事，但劉明轉而推薦陳，陳乃得任董事。陳特別在回憶錄闢謠，二二八事件中他和軍統沒有關係，並批評造成此訛傳的《帽簷述事》作者省黨部主委李翼中。¹²⁶

陳逸松的說辭固然得予尊重，但代表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加入處委會的蔣渭川之《2·28事變始末記》的說法就和陳不同，指出3月5日有部分人在陳家開會議「研究奪取實權的對策方法」。3月6日處委會在中山堂開會時，初是陳逸松為主席，「說明政治時局意義，並發表很多的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等的要求條件。旋即換王添灯做主席，我（蔣渭川）到場時據呂伯雄、廖進平兩君的報告，王添灯、吳春霖等將我們提交的改革原則等都不受理，王氏謂：昨夜在陳逸松氏家裡討論研究到翌晨四時已決定二三十條要求這己〔已〕勝過你們的九條，何必多此一舉。……」¹²⁷ 甚至幾次記載陳要當處委會設置的政治局之局長，¹²⁸ 又說「陳逸松等起草作成處理大綱十條及政治改革三十二條」；¹²⁹ 到3月7日陳儀拒絕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和十條要求時，當晚蔣渭川當面指責劉明說，處理委員大家爭權奪利搶位置，陳逸松自為政治局長，要將臺政改革委

¹²⁶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頁89-90。

¹²⁷ 蔣渭川遺稿，《2·28事變始末記》（汐止：自刊本，1991），頁97。

¹²⁸ 《2·28事變始末記》，頁101。

¹²⁹ 《2·28事變始末記》，頁112。

員會全盤搶去，事情惡化後，陳逸松卻逃走了，為什麼不出來收拾？劉明回答說陳恐怕還在家，要去請陳出來聯絡各團體代表出來共同發表聲明取消三十二條，劉明離去時已近 11 時半。¹³⁰

如果對照他對手蔣渭川的說辭，事件中陳逸松在處委會中一直要掌握主導權，而且不論三十二條大綱、十大要求都和陳有關，但陳在回憶錄中上述大綱、要求，都推給王添灯，以呼應蔡慶榮、蘇新的說法。上述關鍵點對正確理解二二八關係很大，學者陳翠蓮曾進行長期的研究，提出以下值得重視的論點。她說，陳逸松被列入軍統最先的合作對象，¹³¹ 可能是軍統局臺灣站第一任站長陳達元，也是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所挑選。陳達元曾擔任軍統閩南站站長，與在廈門開過律師法律事務所的陳認識，彼此又有陳姓宗誼之故。二二八事件期間，陳為參政員，是當然處委會委員，3 月 5 日在他當主席時通過大綱和「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方案」，而此大綱在陳逸松家討論，由其綜合寫成條文。陳之所以將之說成是王添灯，就是要呼應在中國的臺灣左翼人士凸顯自己在二二八鬥爭中的功勞、甚至說大綱是經過中共地下黨同意的之看法。

陳儀拒絕了大綱，陳知道大事不妙就不再出現在中山堂。同樣被軍統利用的劉明，3 月 8 日接獲陳達元的通知，到陳家帶走陳逸松，然後躲到陳達元住宅（此時已是林頂立居住）。3 月 9 日警總特設別動隊，林頂立為隊長，劉明為副隊長之一，陳逸松為參謀長（一說副司令），別動隊往往配合情報活動進行秘密逮捕、處決的工作。陳本人晚年否定有此事。依「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顯示，保密局（原軍統）的林頂立在 4 月向南京呈報與軍統敵對的中統局包庇陳逸松、劉明等 4 人，隻字不提陳逸松人藏在他家。年底又指控陳逸松經手賄款給審判庭長，使漢奸李天成得以無罪釋放。1948 年又有情治單位指控陳逸松等人聯合要求開釋失蹤的施江南醫師。對於林頂立指示追查陳

¹³⁰ 《2·28 事變始末記》，頁 120-121。

¹³¹ 調查室主任是為了掩護秘密組織的工作，即公私合併，而後情治系統的「站長」不再兼任公職，因此陳達元的站長乃改由較資淺的林頂立擔任。

逸松、劉明，陳達元只好出面表示這兩人在 3 月 4 日應邀平亂，3 月 6 日陳儀派陳逸松為別動隊副司令，陳每天向陳達元報告，陳達元再轉報陳儀，3 月 8 日軍隊登陸後還協助陳達元緝捕奸逆，表現至佳，陳儀還要推薦他當省府委員。林頂立因此才不再追究二二八事件中的陳逸松。但陳逸松並沒當上省府委員。

1948 年 7 月陳逸松當上了考試委員，這個職位比省府委員更高，似為酬庸。但在被提名前死對頭蔣渭川等人，向保密局檢舉陳逸松是漢奸，提出五點罪狀。之後又有人說他得任考試委員是用金錢買來，後來又說林頂立曾參與推薦。1952 年陳又有所謂貪污案，跨民社黨案，後者調查屬實，1954 年考試委員到期未續任。從此轉行營商，但 1964 年又出馬競選市長但落選，已如前述。¹³²

由上可知，陳逸松自陳和其他同時代人的遺稿以及相關檔案顯示的頗多不同，但他嫻熟律師業務、又有從政當高官的熱望，如果在正常國家，他可以順當地進入政壇；然而他所面對是利用特務、流氓治國的不正常國家，無法真正了解中國的派系、情治人員間的鬥法，是他無法成為政治人物的原因。由於他畢竟是個人物，國府對他仍不放心，欲羅織其入罪，雖不成，但已成為驚弓之鳥。陳翠蓮指出，「陳逸松最後出逃、投向共產黨，作為報復。」¹³³

(三) 由自由作家到學術中人的楊雲萍

1921 年 16 歲的楊雲萍放棄就讀醫學校選擇了臺北州立第一中學，又畢業自日本文化學院，受菊池寬影響，已註定其往後朝文人作家的路邁進。自 1934-1945 年止，以作家為職業，寫詩、小說，也從事臺灣文化的研究，一度在謝龍濶的慫恿下要進入天津《庸報》服務，因妻子的強烈反對而沒有成行。¹³⁴ 他

¹³²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頁 148-170。

¹³³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頁 137。

¹³⁴ 此為楊老師向我說的，也求證過楊師母。

可能沒有預想到往後進入學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而一意從事教學與學術研究的工作。

1945年8月戰爭終於結束，楊和每個臺灣人一樣，即將面對一個全新的局面，舊學根柢和白話文造詣，使他面對中國統治，在書寫上較少轉變的挑戰，他雖在皇民奉公會成立後擔任一些職務，也參加「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但畢竟沒有太多「媚日作品」出現，也因沒有擔任過臺灣總督府的官職，使他在面對祖國時的立場較不尷尬。1946年4月陳儀來臺半年，楊自行申請取得「臺省行政長官公署甲種公職候選人審查合格聲明臨時證明書」，當時楊似具有任公職的意願，6月底他取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的聘函」，參議是何職？陳儀和楊是否見過面，均不得而知。我曾企圖多次利用談天的機會請教楊對陳儀的看法，楊只說陳儀很器重他，不及其他，更不用說批評。我也試圖尋找是否是哪位半山將楊推薦給陳。我想到游彌堅，他原名柏，在日本大學政治經濟科就讀，楊也在日大讀過3年的預科；另，兩人在日留學期間都加入新生學會與東京臺灣青年會。¹³⁵ 而且7月他就被派在臺灣省編譯館任編纂和編審，8月被命為臺灣研究組主任。楊何以被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重用？1981年楊追憶許壽裳時，曾說明許壽裳在北京時曾看過楊中、日文著作，因此請洪炎秋找楊去見面，請他進入編譯館工作。¹³⁶ 楊答應後，立刻推薦留用3位日人在研究組工作。臺灣研究組的工作完全走向純學術研究，分為四：一是編印目錄、叢書、昔時文獻；二是研究先史時代的遺跡、民俗、高山族語言；三是出版《臺灣學報》（原稱《東寧學報》）；四是編著臺灣地理、臺灣史；四是調查日治時期的檔案。¹³⁷ 如果能給他時間、臺灣政治沒有大變化，也許臺灣史的研究將陸續進行，不料二二八事件發生，臺灣省主席魏道明上任後在第

¹³⁵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37-42。1946年6月臺灣文化協進會成立，楊加入，7月成為編輯組主任，與當會長的游不無關係。

¹³⁶ 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4（1981年10月），頁28。

¹³⁷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該署，1946），頁110。

一次政務會議即決定裁撤臺灣省編譯館，將剩餘的工作交由臺灣省通志館來承接。¹³⁸ 表面上楊雲萍失業，但他很幸運地被許壽裳推薦給臺大校長陸志鴻，而轉到臺大歷史系任教，成為「史家的楊雲萍」。¹³⁹

楊雲萍不單單在進行臺灣文化的全面研究，也在《民報》社當編輯顧問和寫社論，對長官公署的文化接收工作有所提醒，對社會現象有所針砭，篇篇都值得再三吟味，其中寫於陳儀來臺 2 個月後，即〈一個誤會〉，指出一部分外省人對臺灣的錯誤看法，認為日治時期的臺灣幾乎對中國和世界的思潮隔絕，臺灣沒有思想與學術的演進，那是一個誤會。亦即他們不明白「實際」，只立在「誤會」之上，還排出「指導者」的架子，用從我們來看已沒有什麼希望的「東西」，得意地想要來教訓臺灣人，¹⁴⁰ 罵得很痛快，是繼王白淵〈告外省人諸公〉¹⁴¹ 一文，痛罵外省人對臺灣人抱著優越感，提醒臺灣人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一樣的痛快。楊在 1946 年 6 年開始掛名編輯的《臺灣文化》，旨在介紹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學，文藝相關的文章共有 205 篇，和臺灣社會、教育、政治、歷史的篇章不過 10 篇，他在此雜誌撰文不多。這本雜誌相信不太能符合其脾味。在發現的「臺灣文化協進會第一次大會宣言」中他配合提出的口號，¹⁴² 用了「日寇」兩字，是他在《民報》所沒有用過的，但也顯示他配合當局使臺灣文化協進會和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臺灣省編譯館，成為改造臺灣文化三個單位之一的努力。另一能延續戰爭後期《民俗臺灣》風格的是 1951 年 2 月出版的《臺灣風物》，雖在編輯過程也是困難重重，但他既編又

¹³⁸ 林春蘭，《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臺南：臺南州立圖書館，2002），頁 172-174；黃英哲，《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東京：創土社，1999），頁 12。

¹³⁹ 北岡政子等編，《許壽裳日記 自 1940 年 8 月 1 日至 1948 年 2 月 18 日》（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刊行委員会，1993），頁 255，1947 年 7 月 10 日；頁 261，1947 年 9 月 9 日。至於何時獲頒教授證書則不詳，但追溯自 1946 年 8 月。

¹⁴⁰ 楊雲萍，〈一個誤會〉，《民報》，1945 年 12 月 25 日。

¹⁴¹ 王白淵，〈社論：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 卷 2 號（1946 年 1 月 25 日），頁 2。

¹⁴² 「建設民主主義的台灣新文化！肅清日寇時代的文化的殘渣遺毒！本省的文化以貢獻示範整個我中國！三民主義萬歲！」

寫（很可能也沒有應有的津貼），又不願配合增加一些與刊物內容不合的詩，¹⁴³因此他只編了1卷1期至2卷8、9期合刊本。雖說主編時間不長，但他邀到一些介紹臺灣人西文史料、學人的著作目錄等，倒也多少完成了一些他在編譯館想做的工作，也盡到為往後臺灣史研究奠基的責任。

此後楊不再從事編輯工作，反而流連於書肆、骨董市場，買書、教書、玩錢成為生活的重心。但做為一個「孤高」的智者，在某些重要的場合也適時提出看法以阻止某些「諂媚領袖」的舉動。楊之弟子林瑞明說，大約蔣介石過世那一年（1975），楊到中國歷史學會開會，丁中江上台發言說，蔣公功勞很大，建議給「國聖民父」的稱號，會場的人都傻了，楊老就衝上講台，說這樣做是陷蔣公於不義，又不是封建時代，給什麼諡號。¹⁴⁴當然此事無疾而終。

楊老不喜歡政治，喜愛研究學問，政治與他無緣，也就沒有如陳逸松有數奇的一生，但他傳下連雅堂的臺灣史香火，一直到黃富三接棒，而後棒棒相傳。

（四）壯志未酬喪命鹿窟的呂赫若

戰爭結束，另一個時代的來臨，做為一個成名作家而言，最痛苦的莫若是寫作語言的改換，他無法再操弄熟悉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想要說的，而他編一些配合皇民化的話劇，是否會被舉發，陷入御用紳士、漢奸的泥淖？當時和呂有同樣經驗的人，咸信莫不忐忑難安。呂在9月立刻加入三青團，還擔任臺中分團準備處股長，也等於給了自己一把保護傘，也顯示在思想光譜上他是偏向左翼的。10月10日戰後臺灣第一個雙十節，池田敏雄有事要找楊逵，和立石鐵臣兩人到臺中，他們看到街上喜氣洋洋，解放氣氛甚濃，碰到呂，呂「正陶醉

¹⁴³ 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頁60。

¹⁴⁴ 許雪姬等訪問，王昭文等紀錄，〈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4），頁151-152。

於亢奮中，與過去大為不同。」¹⁴⁵ 據其子呂芳雄言，其父對中華民國有高度期許，還教導子女唱國歌。1946年1月，他成為《人民導報》的記者，在臺北購屋並買下二手鋼琴，6月就發生「王添灯筆禍事件」，¹⁴⁶ 之後《人民導報》被迫改組，社長之一的王添灯、蘇新總編輯、吳克泰、呂赫若去職，9月和蘇新、王白淵、蔣時欽、孫萬枝等人創刊左翼的《自由報》，王添灯任社長，呂也參加。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將家眷遷回社口岳母家。1948年受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所聘，到建國中學教音樂，一般認為這時呂受到陳的影響，思想逐漸左傾，實則不然。¹⁴⁷ 1948年秋，地下刊物《光明報》創刊，呂也成為其中一員，擔任主編。往後又變賣臺中潭子的祖厝「建義堂」，將所得經營「大安印刷所」，表面上出版一般書籍，事實上是印製地下工作宣傳文件。¹⁴⁸ 按《光明報》是1947年7月創立的基隆中學支部所出版，負責人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呂認識鍾，也將妻舅林永南介紹到基隆中學當化學老師。¹⁴⁹ 呂擔任《光明報》的印製時，必已加入共產黨無疑。1949年8月，基隆市工作委員會被當局破獲，鍾浩東被捕，¹⁵⁰ 呂被迫逃到中共所設的鹿窟武裝基地，¹⁵¹ 據國家安全局談到呂赫若的角色為：

1950年7月上旬，再派呂赫若至香港，由林良材介見古中委，請示工作方針，呂匪往返均乘大武崙走私船，同年8月下旬回臺。匪古中委曾允派數名高級幹部，來臺擔任訓練幹部工作，並允送三部電台備用。另

¹⁴⁵ 張恆豪，〈呂赫若生平寫作年表〉，《呂赫若集》，頁318。

¹⁴⁶ 〈日人統治時代之暗影 又重演於今日之高雄〉，《人民導報》，1946年6月9日，第2版。

¹⁴⁷ 不論張恆豪和林至潔在編呂的年表時都如此寫，但如前所敘，他早期已受其妻舅林寶煙的影響，只是何時正式加入地下黨則不清楚。

¹⁴⁸ 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頁723。

¹⁴⁹ 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頁720。

¹⁵⁰ 〈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1-9。

¹⁵¹ 所謂武裝基地，即創造小型根據地，配合地下黨組織的工作，以越鄉的方式，由點而面發展，其任務是以武裝開展群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見〈匪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4。

計劃密送偽臺幣，作為工作費用及擾亂臺灣金融，至配合作戰迫近時，即空投武器及傘兵，以加強戰鬥力量。此外，古匪並曾與呂匪約定於1950年11月20日，在鹿窟光明寺會晤，但屆時並未前來，以後因聯絡困難，遂與香港斷絕消息。¹⁵²

這是說明1950年7月呂曾偷渡赴港和中共華東局進行聯絡的工作。由一個作家、音樂家而成為第一線的聯絡人員，其改變不可謂不大，為了臺灣解放而做的努力，也值得大筆特書。也許正如許強所認為，「我從事這種組織活動，是拯救全民的。」¹⁵³ 呂赫若的想法也正如此。

據說他擔任發報工作，由於收訊、發訊不能常在固定地點以免被破獲，因而到山間，終於在1951年喪身蛇口。1993年林至潔為了查明呂的最後形影，曾到鹿窟訪問王文山，他目睹呂被蛇咬傷毒發到過世，後由其同志李石城將他葬在山頭。¹⁵⁴

由「光復」到呂死亡，不過5年餘，這些年中，他有相當充實的生活，首先是用不太熟悉的中文寫了三篇小說，加入臺灣文化協進會，參加第一回音樂座談會，被聘為音樂演奏會的籌備委員在建國中學、北一女初中部教音樂，又開演唱會，音樂專門委員，還當選了臺灣藝術建設協會理事，¹⁵⁵ 有相當充實的文化生活。設使環境許可，他可能會成為一流的小說家、音樂家；若他不遭蛇吻，也會被政府以叛亂罪名處決。可謂時代下的悲劇英雄。

¹⁵² 〈匪鹿窟武裝基地許希寬等叛〔亂〕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頁160。

¹⁵³ 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490。此為呂赫若的妻舅林永南與許強同獄時，向許當面提問得到的結果。

¹⁵⁴ 林至潔，〈呂赫若創作年表〉，頁738。林同時也提出呂的外室蘇玉蘭，呂要偷渡香港時，向其詭稱等琉球航班要去日本經商。呂之死除了毒蛇咬死一說外，另一說是有人因怕呂出來自首，在山裡頭先槍殺了他。

¹⁵⁵ 黃英哲，〈呂赫若 略歷〉，頁410-413。

六、結論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三人，大約活在 1900-2000 年間，三人中年紀最大和最小的差距不過 8 年，可以說活在同一個世代。他們所面對的時代為何？當他們 3、40 歲時面對皇民化時期，之後日本敗戰投降、國民黨的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撤退來臺、白色恐怖／冷戰時期，乃至解嚴，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他們如何肆應時代，做出抉擇，形成他們各自的人生。生前他們 3 個人互相認識，惺惺相惜，也都是文化人，但性格有別、結局各有不同。本文利用三人留下的主要史料，參以當代人的旁證，以皇民化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前後、白色恐怖這四個人生的階段來加以比較，以瞭解其共相與殊相。

一、皇民化時期(1937-1945)：隨著盧溝橋事件發生，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尤其 1941 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只要是當時的菁英，幾乎全被羅致到上自奉公會本部下至奉公班中，陳逸松即使因「非國民」而不能擔任臺北州皇民奉公會支會參與，但他被迫由南到北演講宣傳聖戰，一度因為與東港事件的歐清石相識，險被羅織入罪；他也捐資出版《臺灣文學》與日人的《文藝臺灣》對抗；對藝能奉公會的演出不滿，共組「厚生演劇研究會」演出張文環的「閩雞」，充分顯示臺灣人對建構自己文化的立場。楊、呂兩人一長於詩、一長於小說，各擅勝場，1943 年楊出版《山河》詩集，1944 年呂出版《清秋》小說集，相互輝映；也因兩人的傑出表現，不能不成為皇民奉公會文學部、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等相關組織的一員，呂在電台主持節目並編劇符應現況，其表現有可議之處；但他以寫小說來表明自己的立場，當時和往後的研究者，無人能將之視為「皇民作家」，反因其文學造詣而被稱為臺灣第一才子；楊則大力提倡研究臺灣文史，身體力行，不稍懈怠，雖被指定為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的一員，但在大會的發言以及回臺後的發言，言不及義，完全沒有自失立場。三個人在這段時間，都一面努力配合當局的要求，但都自有妙招來維持起碼的尊嚴。

二、戰後面對中國新政權：三個人在這段期間都想積極表現，以報効於新的政權。由於楊、陳均有中文底子，且因沒有媚日事蹟，陳逸松被指定為三青團臺灣區團部主任，集合各地有志之士加入三青團，維護日本投降後到中國接收間空窗期的治安，當時他儼然如臺北州知事，頗有能耐。但一旦接收完成、李友邦回臺後不久，他就離開三青團。之後創立《政經報》，批判時政，以被禁收場。他對參政極有興趣，當選參政員，而有機會在二二八事件中大展身手。楊則受陳儀、許壽裳重用，擔任臺灣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主任，得以遂其研究臺灣文史的宿願；另一方面他以如椽之筆在《民報》寫社論，痛陳行政長官公署的臺灣文化政策的加強之道，但效果不大，不過這也是他一生中撰文最多的時期。呂則勤於加強中文，撰寫小說，並在音樂專長上發揮，也在蓄積成為小說家的能量，一邊重作馮婦，擔任《人民導報》的記者，往後加入《自由報》，上述兩報都是左翼相關報紙。

三、二二八事件期間：二二八事件是影響臺灣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對這三個人而言也成為人生重要的關鍵點。陳逸松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主導了三十二條大綱及八大項要項的起稿，並擔任主席通過，此角色應該是政府追殺的對象，雖然往後對其罪證的舉發不斷，但他不僅安然渡過而且被任命為考試委員，關鍵之點在於陳儀的諒解以及陳達元出面止謗。然因陳達元調職後，陳被發現有跨黨問題因而停止從政之路。而其在二二八事件扮演的角色，並未因其近年回憶錄的出版而解惑，仍然引起多方的關注、解讀。楊雲萍則因二二八事件而失去編譯館的職位，但因禍得福，而得以出任臺大歷史系教授，因其不愛政治，而得在 40 年的歲月中成為傳承研究臺灣史香火的重要學者。呂赫若在事件中已加入左翼報紙的行列，二二八事件之後就投入實際的反抗運動，甚至加入中國共產黨、開設大安印刷廠，印刷相關宣傳品。此一事件對 3 人的影響很大由上可見。

四、白色恐怖時期：1949 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國民黨已有遷臺打算，因而先是戒嚴，再頒布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加強對臺灣的控制和左翼人士的逮捕，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給予臺灣左

翼人士積極活動的動力。基隆中學事件發生後，呂不得不逃入鹿窟武裝基地，並潛往香港與中共華東局聯絡，回臺後因在山中收發電訊而被蛇咬死，壯年過世，賣志以沒。陳逸松在考試委員卸任後，到 1964 年 60 歲時出來競選臺北市長慘敗，可見其從政之心並未少歇。1974 年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當局懷疑陳涉案，被捕，3 日後才獲釋。當時中國已進入聯合國，諸國紛紛與「臺」斷交，陳進行其冒險之旅，進入中國，以代表臺灣人的身份擔任中共人大、政協委員，成為他後半生的驚奇之旅，但在臺灣則毀譽參半。楊則悠遊學界，偶出針砭之語，不再有任何文學創作，也許是臺灣文壇的一大損失。

總之，臺灣島在 1895、1945 年兩易其主，本來臺灣應是臺灣人的臺灣，卻是「百年辛苦由他人」，這三位臺灣菁英不能免於在中年改朝換代，各有因應方式，有的積極投入政界卻鳥盡弓藏，終究只是白忙一場；楊有機會進入公務系統，進行臺灣研究，卻因館撤而任臺大教職，塞翁失馬焉之非福。呂為推翻國民黨，加入共產黨，為了出版宣傳品，賣祖厝開印刷廠，直接投入反政府活動。卻因鍾浩東被捕，不得不進入武裝基地，從事危險的工作，終至意外喪生，與歷代的仁人志士為社會而殉難者同樣可貴。

1938 年吳新榮說陳逸松是正義的使徒、楊雲萍是熱情的詩人、蘇子蘅是良心的學者，2016 年的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陳逸松、楊雲萍、呂赫若這三個人？有異於吳新榮 1938 年的說法，我認為楊雲萍是良心的學者、呂赫若是正義的使徒，陳逸松呢？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本文於 2016 年 8 月 31 日於綠島完稿】**

引用書目

《人民導報》

山川鄰

1941 《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東京電報通信社。

不著編者

1929 《臺中師範學校職員生徒名刺交換會》。臺中：臺中師範學校。

中島利郎等

1999 《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 臺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東京：綠蔭書房。

2005 《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94 《日本共產黨の七十年 黨史年表》。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刷。

王白淵

1946 〈社論：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2(2): 1-2。

北岡政子等編

1993 《許壽裳日記 自1940年8月1日至1948年2月18日》。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

向山寬夫

1978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民族運動史》。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

何義麟

未着覆刻年 〈《政經報》與《臺灣評論》解題—從兩份刊物看戰後臺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收於《政經報》，頁5-18。臺北：傳文文化事業公司。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

2007 《吳新榮日記全集》(1933-1937) 1。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2) 6。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3) 7。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1944) 8。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呂訴上

1991 《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再版。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

2006 《呂赫若小說全集》(上)(下)。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呂赫若著、胡風譯

1936 〈牛車〉，收入《朝鮮臺灣短篇集—山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呂赫若著、張恆豪編

1991 《呂赫若集》。臺北：前衛出版社。

呂赫若著、鍾美芳譯

2004 《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

李道明

2001 〈驀然回首—臺灣電影一百年〉，《歷史月刊》，158: 41-51。

李翼中

1992 〈帽簷述事—臺事親歷記〉，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 371-4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林春蘭

2002 《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臺南：臺南市立圖書館。

林瑞明、許雪姬主編

2011 《楊雲萍全集》文學之部(一)、(二)。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國家安全局

1959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臺北：國家安全局。

1961 《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臺北：國家安全局。

梁明雄

1996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莊嘉農(蘇新)

1949 《憤怒的臺灣》。香港：智源書局。

許雪姬

1999 〈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167-211。

2006 〈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3): 109-151。

2007 〈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9: 1-75。

- 2007 〈《高玉樹回憶錄》序〉，收於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國民黨治下的黨外市長：高玉樹回憶錄》，頁 vii-x。臺北：前衛出版社。
- 2011 《楊雲萍全集》歷史之部（一）至（四）。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 2011 《楊雲萍全集》資料之部（一）、（二）。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 2015 〈戰後初期臺灣人對未來前途的看法與其具體行動〉，收於謝政諭等編，《何謂戰後：亞洲的 1945 年及其之後》，頁 37-62。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雪姬主編

- 2008 《楊雲萍文書資料彙編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許雪姬等訪問，王昭文等紀錄

- 2014 《奔流：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

- 2010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文惠

- 2011 〈陳逸松二三事（上）：一九四五—一九七二年之紀事〉，《傳記文學》99(5): 4-21。
- 2011 〈陳逸松二三事（下）：一九七二至二〇〇〇年之紀事（一）〉，《傳記文學》99(6): 93-104。
- 2012 〈陳逸松二三事（下）：一九七二至二〇〇〇年之紀事（二）〉，《傳記文學》100(1): 80-90。
- 2012 〈陳逸松二三事（下）：一九七二至二〇〇〇年之紀事（三）〉，《傳記文學》100(2): 120-134。

陳姪媛

- 2012 〈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19(1): 87-154。

陳逸松

- 1938 〈學者、詩人、使徒〉，《臺灣新民報》。
- 1941 〈事變處理と本島人の使命〉，《臺灣地方行政》，7(9): 101-103。

1944 〈妻ありて兵強し 新しき誇り〉，《新建設》4: 20-22。

陳逸松、林宗賢、栗原廣美、古屋貞雄

1944 〈思想對策と方向：戰場臺灣の基盤〉，《臺灣公論》，1944年10月號: 38-51。

陳逸松口述、林忠勝撰

1994 《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臺北：前衛出版社。

陳翠蓮

2014 〈「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臺灣史研究》，21(3): 137-180。

彭瑞金等合著

2014 《臺灣文學史小事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曾健民

2015 《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臺北：聯合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英哲

1999 《臺灣文化再構築 1945-1947 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東京：創土社。

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

2005 《我的回憶》。臺北：楊翠華自刊本。

楊雲萍

1939 〈臺大と臺灣の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15-17日。

1945 〈一個誤會〉，《民報》，1945年12月25日。

1981 〈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30(4): 28。

葉石濤

1983 《清秋—偽裝的皇民化謳歌》。臺北：前衛出版社。

1987 《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

194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臺灣總督府

1945 《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86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東京：綠蔭書房，復刻版。

蔣渭川遺稿

1991 《2·28 事變始末記》。汐止：自刊本。

興南新聞社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薛宗明

2000 〈哭泣的鹿窟：臺灣第一位男高音—殉道者呂赫若素描〉(上)，《樂覽》
8: 8-18。

2000 〈哭泣的鹿窟：臺灣第一位男高音—殉道者呂赫若素描〉(下)，《樂覽》
9: 12-20。

蘇瑤崇

2007 《臺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No9, pp.53-98, December 2016

Yang Yun-Ping, Chen Yi-Song and Lu He-Ruo and Their Times

Hsueh-chi Hsu

ABSTRACT

Yang Yun-Ping, Chen Yi-Song and Lu He-Ruo can be said to have lived in the same period. Furthermore, the times that they had to confront – from the Japanization period in their youth, the surrender of Japan, the Kuomintang's (KMT, literally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arrival in Taiwan,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the retrea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to Taiwan, the White Terror / Cold War era, to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 was a period of both darkness and light. Not only had they known and admired each other when they were alive, but they were also literary people – only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endings. To understand their common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collects evidence from documents and contemporary people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based on four stages of their lives (the Japanization period, early post-war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nd the White Terror period). As control of Taiwan changed hands in 1895 and 1945, these three Taiwanese elites were forced to face large transitions during their middle age and each had their method of responding to this change. Some had been highly involved in politics and ended up with empty hands. Yang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the public sector to carry out studies of Taiwan, eventually accepting

a teaching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u He-Ruo on the other hand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overthrow the KMT; and, to publish anti-government propaganda materials, sold inherited properties to build a printing plant. Later, because Chung Hao-Tung was arrested, Lu had to enter an army base and engage in dangerous work, ultimately dying in an accident. In 1938, Wu Sin-Rong said that Chen Yi-Song was a missionary of justice and Yang Yun-Ping was a passionate poet. In contrast to Wu's statemen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Yang was a conscientious scholar and Lu was a missionary of justice. How about Chen Yi-Song? We shall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make a judgement.

Keywords: Yang Yun-Ping, Chen Yi-Song, Lu He-Ruo, Japanization Period, Early Post-war Period, February 28 Incident, White Terror